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www.cnpp.com.cn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

# 鲁迅与20世纪中国 政治文化



李 玮 著

非外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

# 鲁迅与20世纪中国 政治文化



李玮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 / 李玮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3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5500-2720-6

I. ①鲁… II. ①李… III. ①鲁迅著作研究②政治文化 -  
研究 - 中国 - 20世纪 IV. ①I210.97②D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46123号

##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

LUXUN YU 20 SHIJI ZHONGGUO ZHENGZHI WENHUA

李玮 著

---

出版人 姚雪雪  
策 划 毛军英  
责任编辑 臧利娟 周振明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17.5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6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720-6  
定 价 45.00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8-105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让鲁迅重新回到民族的现实生存中去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代序

谭桂林

鲁迅学在中国学界是一门显学，鲁迅与20世纪中国之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都是一个持续热门的话题。成果汗牛充栋，意见纷纭杂陈，尤其是近20年来，国内外鲁迅研究趋势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现象比较明显。一是大众娱乐化现象。一些文化明星以鲁迅作商品，在各种大众传媒的平台上宣讲着各种似是而非的有关鲁迅的言论，消费鲁迅，利用鲁迅，其目的并不是宣传鲁迅，而是以鲁迅的牌号来包装自己，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些江郎才尽的作家则以开涮鲁迅甚至谩骂鲁迅来哗众取宠，迎合后现代文化思潮下社会公众对权威的消解狂欢；一些娱乐媒介甚至把鲁迅与朱安的婚姻、鲁迅兄弟的失和等私人生活事件加以种种的猜测、窥探和渲染，以此娱乐大众。二是价值相对化现象。国内思想文化界有一些学者利用重评20世纪文化论争的平台，或者抬高学术，贬抑启蒙，或者标举胡适，批判鲁迅；不少学者或文化人认为鲁迅的价值和意义在时空上是相对的，鲁迅的

意义在于启蒙，在于对旧文化的批判和毁坏，这种批判和毁坏的力量在鲁迅的时代里是必须的，而当下的时代主题是建设，需要的是平和的理性精神，所以鲁迅是过时的文化英雄，是功能退化乃至错位的文化符号。三是学术的边缘化现象。许多严肃的学者坚守在鲁迅研究领域，但是为了抗衡近20年来鲁迅研究中的浮躁状况，这些严肃的研究越来越学院化、边缘化、琐细化。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成果的突出成就大多集中在研究史的总结、文本技术的解析、资料的整理考据，等等。这三种现象尽管对鲁迅研究的态度、对鲁迅精神的认知截然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倾向却是共同的，这就是从不同的方向把鲁迅这一民族精神的象征同当下民族的生存现实和文化建构疏离开来。正是针对鲁迅研究中的这三种现象，我们撰写了这一套丛书，目的就在于将鲁迅研究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现实和民族命运重新联系起来。

我们认为，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改革的世纪，政治制度的更迭变换是改革的外在形式，而整个世纪中有关改革的思想则总是围绕着若干基本问题而展开。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型的思想家与社会文化批评家，他与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关系当然是十分密切而深刻的。所以，本丛书以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为线索，提出了八个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过程中的、鲁迅曾经深度介入的基本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清点、整理、发掘和重新解读鲁迅这一民族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与20世纪中国的联系。丛书不仅全面切实地梳理鲁迅研究界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深入地解读阐述鲁迅面对和思考这些基本问题时的思路、资源和观点，而且着重分析了鲁迅这一精神象征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建构与形成的内在机制与外在因缘，深度阐释鲁迅这一文化符号在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的能指、所指和功能结构，突出一种从民族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的意义上对鲁迅与20世纪中国关系进行综合思考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观念。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思想史角度的采用和综合思考的方法观念，使本丛书既容纳又超越过去从文学史角度或者学术史角度进行鲁迅研究总结的局限性，在新世纪的鲁迅研究中，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思想、文化与现实融会贯通，多种学科交叉融合的鲁迅研究新思维。

在20世纪的中国，不少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结果形成了激进主义的文化思潮；也有不少刚正的知识分子固守民族的文化血脉，主张以儒家文化融汇新知来渐进改良，结果形成了保守主义的文化思潮。我们认为，在“五四”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也许只有鲁迅的思想真正超越了激进与保守的思维模式，根基的是本民族的经验 and 当下的个体生命感受。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用熔铸着民族本土经验和个体生命感受的思想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改革与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无可取代的精神资源。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左”倾思潮影响下鲁迅研究的机械政治化倾向，鲁迅研究界曾经发出鲁迅研究要“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现在30年时间已经过去，针对近年来鲁迅研究的学院化和娱乐化的倾向，我们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让鲁迅重新回到民族的现实生存中去”的口号。所以，本丛书将通过鲁迅思想的民族化和个体性特点的发掘与阐述，在民族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的基石上，重新建立起鲁迅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密切联系，让鲁迅精神和鲁迅研究重新深度介入中国当下社会改革的民族生存现实中去。

基于这样的立场，在本丛书的写作中，我们强调了三个方面的方法理念。

一是突出问题意识。本丛书在研究思路，以思想史为线索，以问题意识为切入点，来清点、整理、发掘和解读鲁迅这一象征和符号在中国民族复兴运动中的伟大意义、价值及其局限性。这种问题意识的突出，也许能对目前鲁迅研究界纯粹学术研究的学院传统有所突破。本丛书选择的八个问题经过精心选择，其中国民信仰的重建、政治文化的变迁、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等都是我国20世纪精神文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的问题，而鲁迅与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与20世纪中国的文学教育以及鲁迅在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历史上的符号功能与象征意义等，则是本丛书提出的具有创新性的问题。譬如鲁迅与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子课题，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国外对鲁迅的学术性研究，也不仅是鲁迅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活动，我们的重心是鲁迅在20世纪中国对外文化输出方面所起到的历史和现实作用及所达到的积极效果。其中包括收集整理和分析西方主流媒体的鲁迅报道、西方主流教育中的鲁迅课程开设情况以及西方主流大学中文系与文学系对鲁迅的学习介绍情况，尤其是要运用比较的方法来探讨西方主流教育鲁迅课程开设的特点，为国内鲁迅教育以及国外孔子学院的鲁迅推广提供

参考。正是因为本丛书设计的重心不是单纯研究鲁迅在社会文化领域内诸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而是紧紧扣住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着重研究鲁迅这一符号和象征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这一设计方向可能使本丛书的研究另辟蹊径，可以从鲁迅研究浩如烟海而且程度高深、体系庞大的已有成果中突围出来，建构起自己的原创性。

二是强调民族经验。我们认为，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文化批评家，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他同无数现代先进知识分子一样，为了改变民族命运而积极介入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而他与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在中国这块文化土壤里诞生出来的一个思想独行者，他从来就是立足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在“当下”这一时间维度上，以自己对于中国民族生存现实的极其个性化的生命体验为基础，来考量、思索和辨析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所以，鲁迅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贡献乃是他提供了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民族本土性和生命个体化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思想。本丛书在设计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整个课题的论证过程中强调鲁迅思想的民族性，从民族本土经验与个体生命体验相熔铸的观点来阐释鲁迅思想在现代中国思想界不可取代的独特性。这一观念在鲁迅资源与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之关系的研究中具有支撑性的创新意义，同时也能对于国内外近来比较流行的认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是想象的历史，民族国家只是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各种文字记叙中的学术观点给予理论上的回应。

三是解读批判精神。我们认为，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文化巨人，而他的伟大性在于他是一个思想批判型的文化战士，他的特征是民众的立场、人本的理念、积极介入现实的公共情怀、独立思考的精神原则、不惮于做少数派的英雄气度以及信仰的纯粹意义。这种批判不是只问破坏与摧毁式的批判，而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中所倡导的在反思中求证、在扬弃中螺旋上升式的主体自由精神。社会建设需要鲁迅这样的具有纯粹信仰的批判型文化战士来承担社会文化批判的任务，来体现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中坚作用，





使民族的发展、社会的建设始终保持一种人本的取向、清醒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这一观点，我们认为对鲁迅资源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与文化建设的伟大价值的阐释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丛书的写作力图突出两个方面的特色。一是将历史述评与现实透视结合起来。这一研究方法包括两个层面的要求，第一是要求每一个子课题都必须有研究史梳理的论证环节，将研究历史的梳理评述与当下研究现状的透视分析结合起来；第二是要求每一个子课题都必须十分重视鲁迅生前与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与20世纪中国民族发展的命运的紧密关系的研究，也即重视鲁迅的生命史与中国现代革命史之间的紧密的关联，这是整个丛书研究的历史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也就无法说清楚鲁迅的符号意义与精神象征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民族文明建设上的资源价值所在。二是将社会调查与学理思辨结合：本丛书同时具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方面的特质，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项目。因而，本丛书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学理思辨与社会调查相结合的论证途径。在具体研究中，尤其重视社会调查的环节，合理地设计调查内容，精确地统计与分析调查数据和资料，对鲁迅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定位、鲁迅资源在某个现实问题中的社会效应、鲁迅形象在国内外媒体传播中的实际状况、鲁迅资源在国内外文学教育中的功能呈现等等问题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由上海同济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在这方面开启了一个先端，但这一项目目前成果侧重在学术与社会物质文化的层面，我们希望本丛书以社会文化问题为中心，将鲁迅的社会影响调查推进到国民精神与心灵现象的层面，从国内影响推进到国际影响的层面，实现在鲁迅社会影响研究方面的进一步补充与深化。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结项成果的基础上编选出版的。2011年底，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获得全国社科规划立项，这对我们既是一种巨大的鼓励，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5年来，仰仗课题组各位同人的大力支持与辛勤劳作，这一重大项目取得了显著成就，各个子课题组成员总共发表出版阶段性研究成果120余项，其中著作6部，论文110余篇，论文集2部。不少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



学》《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上。最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是课题组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召开了“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从南京走向世界——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青年学术论坛”，这两次会议得到国内外鲁迅研究专家的热情支持，在鲁迅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项目于2017年上半年顺利结项，作为项目的首席专家，我要特别感谢朱晓进、杨洪承、郑家建、汪卫东、何言宏、刘克敌、林敏洁、李玮等子课题的负责人，感谢参与此项目研究的各位作者，是你们的通力合作和智慧付出，才保证了此项目的圆满完成，也保证了本丛书的顺利出版。在2017年11月绍兴召开的中国鲁迅研究会年会上，新任会长孙郁在感言中说，研究鲁迅是自己一生的坚持。这句话，朴实而掷地有声，可以说代表了我們每个鲁迅爱好者的的心声。能够坚持一生，不仅因为我们热爱鲁迅的作品，而且也是因为鲁迅研究是一个高水准的学术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不仅能够始终仰望着一个伟岸的、给我们以指引和慰安的身影，而且能够经常性地与一些这个时代的优秀的、高境界的心灵进行对话。在这个共同体中，经常能够爆发出给人以思想震撼力的研究成果，这也是鲁迅研究一代代学人值得骄傲的事情。当然，这套丛书肯定存在许多缺点，我们不敢期待它能有多么杰出的成就，但如果能够为鲁迅研究这一学术共同体提供一点新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观点与材料，为鲁迅这一民族精神象征重新回到民族现实生存中去起到一点促进的作用，于愿已足。

最后，要诚挚感谢国家出版基金对这套丛书的慷慨资助，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毛军英等领导 and 编辑们对此丛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付出的辛勤劳动。





# 目录

## 绪 论/1

## 第一章 政治文化与鲁迅的人生道路/13

第一节 政治文化与辛亥革命前期鲁迅的“从文”道路 / 13

第二节 政治文化与北伐后鲁迅放弃教职 / 34

## 第二章 政治文化与鲁迅的文化立场/55

第一节 政治文化与鲁迅对“尚武精神”的态度 / 55

第二节 政治文化与1920年代鲁迅的“大学观” / 72

第三节 政治文化与鲁迅的“学术观” / 88

## 第三章 政治文化与鲁迅的代际想象/108

第一节 “新政治”的社会学载体：鲁迅的青年观 / 108

第二节 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 / 122

## 第四章 政治权力场：鲁迅看文学机制/138

第一节 政治文化与鲁迅对于1920年代“新文坛”建设的态度 / 138

第二节 政治文化语境下的鲁迅与1930年代文学出版 / 163

## 第五章 政治文化与鲁迅的文学选择/179

第一节 政治文化与鲁迅文学观中“思想的标准” / 179

第二节 政治文化与1930年代鲁迅杂文风格的转变 / 196

## 第六章 政治文化与鲁迅逝世前后对鲁迅的阐释/206

第一节 论1936年周作人对“鲁迅”的叙述 / 206

第二节 论1936年—1942年毛泽东对“鲁迅”的“引用” / 222

## 第七章 政治文化与1980年代“鲁迅”的“重建” /244

第一节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的政治文化 / 245

第二节 《心灵的探寻》论述框架体现的政治文化立场 / 251

第三节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政治文化分析 / 257

## 参考文献/264

## 后 记/269





## 绪 论

在中国学院制度、学科制度的建设走向稳固，学科分化愈加精细的同时，对学院制度和学科制度的反思也迈开了脚步。引入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恢复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将社会关怀置于研究的首要位置，成为新一代人文研究者的研究趋向。鲁迅研究，因为这一能指场域勾连丰富的社会政治概念、关系和问题，所以在突破制度限制、指向现实问题方面，呈现出先锋的姿态。反思研究的“碎片化”倾向，重建宏观视野，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成为鲁迅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向。

对于鲁迅研究政治性的重新关注，带来了鲁迅研究学术场域的整体变动。政治性的引入，带来鲁迅研究价值的整体重新审视，促使各个鲁迅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不得不应对方法论批判，审视自身的立场性前提。无论是鲁迅研究论文的商榷文风，还是鲁迅研究会议上的唇枪舌剑，鲁迅研究中研究结论和价值立场的激烈碰撞，正表明该研究领域开始摆脱单篇论文或论著的自律性或自治性逻辑，改变作为特定范式话语衍生的研究方式，从而走向研究范式、价值前提之间的对话。具体来说，鲁迅研究就“启蒙鲁迅”和“革命鲁迅”、民族主义鲁迅和世界主义鲁迅、殖民鲁迅还是后殖民鲁迅、政治鲁迅还是文学鲁迅等问题展开论争，这些分歧的背后潜藏着“一致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来自对



中国发展道路的关切。即使是“启蒙鲁迅”“文学鲁迅”，表面上看这些研究服从于学科分化、知识和实践、政治和文学相分离的逻辑，但除了一些纯粹满足于知识衍生的研究，许多文章和论著对于“启蒙鲁迅”和“文学鲁迅”的坚守，也在表达对民族和社会秩序的关注和立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并非是走向政治立场的直接交锋。相反，扩大所谓“政治”的内涵，丰富对政治、文化和学术之间关系的理解，成为重新审视鲁迅研究政治功能的前提。今天，开阔的理论资源和革命、改革经验的累积，已经提供了学术参与政治的新的可能性。只要稍稍借鉴话语分析、文化研究的思路，就可以指认学术制度、信仰以及主体身份的构造特质、权力关系以及政治性影响。解构主义和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式，则对所有文化和知识表述方式的霸权性和边缘性进行区分。马克思主义被运用到审美领域，审美风格和趣味的社会学特质也相应地被揭示出来。这些思路带来对于中国学术实践和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纯学术”“纯文学”的意识形态特质不能再被充分掩盖起来。由此，新的学术活动将具有这样一种自觉性，即学术研究的“万事万物”（包括研究对象、方法、逻辑、结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动机和倾向（尽管这可能是“无意识”的）。“政治”不再被局限于政权斗争，它的所指在语言层面、文化层面得到扩大，从而联结着对于“事实”和“现实”的认定，联结着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建构。就鲁迅研究来说，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意味着不再局限于鲁迅学这一学科体制之内，而是带着对学科体制政治功能的审视和批判（并非是否定）进行鲁迅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论题的确立、逻辑的编织亦不能回避与研究者的“现实语境”之间的关系，明确研究及结论得出的前提是在于针对“现实语境”的“问题”，而非研究假定的“历史事实”。

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也并非完全否定鲁迅研究界以科学理性和经验性论证为主导的研究方式。该研究方式假定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强调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客观化“还原”，或是对客观规律的发现和揭示。虽然20世纪诸多历史哲学对将科学理性运用于历史研究领域的“错位”加以分析，但它们不足以将科学理性完全排除在历史构建方式之外。借助作为具有普泛影响的科



学世界观，结合经验实证的逻辑，打造具有“目的性”的历史叙事编织，从而推陈不容置疑的“客观”规律。这种历史研究具有强大的社会实践功能，即将“叙事”确定为“事实”，以“客观性”“介入”社会现实。今天，认可科学理性历史叙事的价值，并非认可其“客观性”，这恰恰是解构主义语境下科学理性最受质疑的方面。科学理性历史叙事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社会历史功能，即通过对“客观性”的构建影响社会现实。不完全否定科学理性叙事的价值，而是对科学理性叙事价值的重新认定，意味着历史研究价值标准的结构性转换，即从追求“事实真理”走向“理性真理”。如果说“事实真理”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假定性基础上，将经验性感知直接作为客观性的“事实”的话，那么“理性真理”则强调感知产生的认知框架和功能。“理性真理”标准下的历史研究，首先检验的是叙述历史时的问题假定、概念界定以及关系功能。在这一标准审视下，历史叙述所呈现的将不再是一幅清晰的事实图景回放，而是在“讲述”中浮现的历史对象、主体和依存的制度的权力关系，“历史事实”和“客观性”成为在这些关系中“漂浮的能指”。后者虽然具有暧昧不清的“不确定性”，但因其通过对“历史”的“再历史化”，重新恢复了历史叙述和现实政治的张力，开启“政治”的理性化批判的空间和功能，因而具有超越科学理性的“真实性”。重启鲁迅研究政治性的价值，也并不是在“事实真理”层面，而是在“理性真理”层面。强调鲁迅研究的前提、概念以及对对象选择、叙事方式的政治功能和现实指向，并不是说鲁迅“本来”或是“普遍”具有政治介入功能，而是呈现对鲁迅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的赋予和构建，在关系语境的考虑中探讨各个“鲁迅”的价值。

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强调研究的实践功能，但避免走向意识形态化。现实关怀和当下意识，是推动鲁迅研究政治化的强大动力。它带来对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重新审视，通过将知识表述视作“话语实践”，凸显学术的社会学意义和功能。其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重新被重视，思想的“物质性”、理论的“社会性”、表述的“实践性”得到伸张。但重新审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并非恢复理论指导实践的庸俗化理解，也并非走向特定政治立场的意识形态化。重视“话语实践”的价值，其中重要的内容是重视“话语实践”

中所具有的理性批判的功能，在“去中心化”的意义上使用理性批判，而不是走向“普遍化”和“权力化”。意识形态批判要避免走向“普遍化”和“本质化”的意识形态，要坚持自我批判，从而避免走向制度化。所以，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最终目的，是在“复数”的政治关系表达中，营造政治对话的空间，它将从“本质真理”走向“关系真理”，即在相互关系中呈现各自的功能和边界，在“虚假”的对照中实现“真实”，在对“客观”不确定性的呈现中实现“客观性”。相反，如果对所谓现实关怀和当下意识本身不加理性审视和批判，“政治性”的追求是以“普遍化”和“权力化”为特征并且付诸制度建设，那么，它将陷入另一种“本质真理”的幻觉中，它的教训对于经历过20世纪的每一人都不陌生。所以，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以开启鲁迅研究的政治对话空间为应有之义。

## 二

鲁迅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于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而且在于鲁迅的文学、文化活动与中国政治、社会变动紧密相连。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时时刻刻反映和表现他所面向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同时，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进行的阐释、言说、研究和引用，已经被“编织”在20世纪中国，乃至之后社会政治变动的过程中，成为推动、影响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通过研究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以及对于鲁迅身后符号化“鲁迅”的研究，能够塑造面向中国社会政治变动的精神资源。

鲁迅所经历的社会改革进程不能回避政治的影响作用，对此，学术界并无异议。但问题是，鲁迅到底怎样受着政治变革的影响，鲁迅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到底怎样，鲁迅的文学因此具有怎样的价值？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曾出现截然对立的理理解。概括来说，一种是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初，为凸显鲁迅的“政治性”，认为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代言人”。另一种是1980年





代以降，对于鲁迅文学创作“自主性”加以强调。在简单地判断孰是孰非之间，我们首先应该寻找对立观点的“一致性”，即造成对立的根本性命题。

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末，鲁迅的学术研究的兴盛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有密切关系。党的领袖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价值的概括和评价对鲁迅身后数十年代的阐释和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这在建国后至1970年代末期间表现得最为直接。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和概念，被用来“解读”鲁迅。鲁迅的思想被定位于“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等。对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如“农民问题”“小资产阶级问题”以及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有关内容构成了鲁迅创作的阐释体系。至于研究的具体视角，则为“唯物史观”，鲁迅阐释的逻辑始终未曾偏离将鲁迅视作体现无产阶级文化发展壮大“必然性”的“典型”。由此，艺术手法也侧重于文学反映论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当然，概念和侧重点也随着领袖思想的发展发生具体而微的变化。这在“文革”时期最为显著。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从属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为建立和巩固生产关系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构建过程。无论是对“鲁迅”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标杆的“塑造”，还是研究者本身致力于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服务的研究动机和研究方式，都根本上受到当时的体制和思想层面的政治文化的影响。

1980年代以来新的研究范式的引入，推进了鲁迅研究。首先，鲁迅思想和创作中“非政治”的成分格外受到关注。1980年代前期，对鲁迅思想的研究由“反资产阶级”向“反封建”转移（与此相联系的知识衍生是，鲁迅与一系列和“启蒙”有关的范畴的联系考察，诸如与“立人”、民俗思想、教育思想、国民性思想等等）。而1980年代后期，研究者的注意力则从“宏大历史决定论”转移到“个体精神”上来，特别关注鲁迅思想中具有“反抗”“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分。诸如区别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社会进化论的“中间物”思想、“孤独”、“绝望”、“荒诞感”或是“反抗绝望”的思想得以重视，并贯彻到对其文学创作的解读之中。于是，“另一部分”作品成为鲁迅研究的重点，比如在五六十年代被“忽略”的《野草》《故事新编》，以及《彷徨》集中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等。与此相对应的是，鲁迅文学创作所使用的艺





术形式的重要性也随之发生向“现实主义”之外的倾斜，“象征主义”“复调”等成为鲁迅研究论述的重点。其次，在研究角度上，摒弃了“历史决定论”的“线性”思维模式，崇尚“回到鲁迅本体”的“文本细读”，注重“审美现代性”与鲁迅创作的关系。于是，在“文本研究”“诗学研究”等研究视角下，鲁迅的“比较研究”也重在发现鲁迅与具有“审美现代性”的同构性，而非强调鲁迅与其“异构”。

是“依附性”还是“独立性”，是“政治的留声机”还是“非功利的审美现代性”，鲁迅的研究在对这些问题的辩驳中发生巨大转变。而需要注意的是：鲁迅阐释方式的转变并非仅仅是“回到鲁迅自身”的研究动机使然。我们应该看到该种研究动机背后的“历史之手”。鲁迅研究方式的转型根本取决于文学标准的转变。与五六十年代将“政治标准”作为“文学标准”的情况正好相反，1980年代的文学标准将“非政治”与“文学性”建立紧密关联。这种文学标准也正是特定“政治文化转向”的产物。将与“政治”的对抗表述为“文学”概念中的“应有之义”，正反映出“文学”并非如此“独立”，它依然置身在“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中。只不过，此时政治文化正推动文学应和于1980年代政治对“极左思潮”的反抗，并服从于加剧“专业化”的文化体制。也就是说，1980年代鲁迅研究范式根本受制于1980年代由政治体制决定的政治文化，造成1980年代对鲁迅政治性认识和1980年代之前鲁迅研究对立的恰恰就是不同的政治诉求。

本研究所针对的问题是1980年代之后“去政治化”思潮带来的学术和思想问题。在“文化超越政治”思路的推动下，文化和文学和政治的距离被拉开，在失去该思路原有的社会变动推动力后，1990年代后的文化、文学活动呈现“去政治化”<sup>①</sup>的特点。在“去政治化”语境下，鲁迅研究淡化鲁迅及鲁迅阐释的社会历史功能的问题，认为忽视鲁迅与外部社会历史变动之间密切关系的观点，或者是认为鲁迅的价值在于对政治历史的审美超越的观点，有一定的局

<sup>①</sup> 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